

# 太平桥

## 一座坚挺的精神标的

□徐泽万



(资料图片)

在龙南城西南62公里外的山水深处,杨村镇的车田村,宁静地守着一座桥。它的名字,叫太平桥。几百年的光阴,对于浩瀚的历史来说或许只是一瞬,但对于这座以“太平”为名的石桥而言,却承载了太多的风雨、传说与人间烟火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座沟通两岸的建筑物,更是一块沉甸甸的活化石,凝结着明末清初工匠的智慧,回荡着王守仁平定匪乱的历史足音,也浸透着民间朴素的信仰。它是一座有魂魄的桥,以其奇特的造型和坚挺的品格,成为伫立在太平江上的一座精神标的。



太平桥的奇特,首先在于其形。它不是寻常所见的单拱或联拱石桥,而是一座“两孔三墩、四拱双层重叠组合”的石桥。这种结构,在桥梁史上堪称一绝。远远望去,下层两座巨大的主拱圈,以精磨的花岗石严密砌筑,跨距皆逾11米,如巨人的臂膀,沉稳地插入两岸的基岩,将湍急的江水驯服于胯下。拱高6米有余,即便山洪奔涌,亦能从容泄流。尤为可贵的是那砌筑的工艺,石与石之间,不见半分懈怠,所用灰浆,乃是以桐油、石灰、红糖,再以浓稠的糯米浆捣制而成。几百年过去,这灰浆已与石头融为一体,色泽深赭,坚逾铁石,这是东方古老建筑智慧的明证,是将寻常饮食之物,化为确保千秋基业之坚韧筋骨。

然而,匠心的高妙远不止于此。在下层两座大拱的拱顶之上,竟又稳稳地承托起上层一座跨度8米余的砖拱,拱肩就落于下方两拱之顶,构思之精妙,胆魄之雄浑,令人叹为观止。这上层砖拱上,还构建了一座四通凉亭,青砖木柱,飞檐翘角,如鸟斯飞。亭额北向,刻着“太平桥”三字,乃清朝年间督理重建此桥的族正赖懋杰所书。宇迹端庄厚重,笔力千钧,与整座桥的沉稳气势相得益彰。这座凉亭,不仅供往来者憩息、览胜,更使得整座桥的轮廓在青山绿水间,显得格外挺拔飞扬,既有长虹卧波的流畅,又具楼阁凌空之巍峨,无怪乎能被收录于《世界桥梁大观》之中。

一座桥的诞生,往往关联着一方水土的记忆。太平桥的始建,其根源可追

溯至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春,身为南赣巡抚的王守仁,率兵进入龙南太平堡,既为平定当地的骚乱,亦为镇压接踵而至的三洲匪乱。战事平息之后,王守仁在回师赣州途中,于太平堡水口岭处倡建此桥,并命名“太平”,其用意则深远得多。这“太平”二字,绝非胜利者简单的标榜,更蕴含着他对秩序重建与文教敷施的深切期望。烽火暂熄之后,如何让这片土地真正获得安宁?一座桥,连通的不再是物理的崖岸,更是战乱后破碎的人心,是由“破山中贼”转向“破心中贼”的象征性开端。据史料记载,阳明心学在此地传播之后,民风为之渐变,“市民亦知冠履,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太平桥,便是这场深刻精神教化的见证者之一,它默默地伫立着,看文明的风俗如何一点点浸润这方山水。

而玄妙奇瑰的民间传说,又为这座桥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传说桥之下游十余米处的江心,天生一巨型奇石,状若卧伏的水牛,乡人称之为“石水牛牯”,奉若神物。有诗咏叹道:“可惜江边一瘦牛,迄今不知几春秋。洪水滔滔推不动,细雨霏霏作汗流。纵多嫩草难下口,铁鞭任打不回头,过往君子牵不起,天地为栏夜不收。”这首诗将石牛的形象与神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民间更流传,此牛有灵,夜间会化身而去,到广东连平地界偷食禾麦。这充满想象力的传说,折射的是农耕时代乡民对风调雨顺、牲畜肥壮之朴素祈愿。

故事的转折来自一位风水先生说的话:“牛要在栏内,怎可在栏外?神牛在桥下,必往外地爬;神牛在桥上,保得太平旺。”这句近乎谶语的话,触动了当地乡民的心弦。于是,在清嘉庆至道光年间,以族正赖懋杰为督理,杨村百姓

广集资财,鸠工庀材,将原桥拆毁,在下游百米的此处,也就是能将“神牛”置于“栏内”的方位,重建了今日我们所见的这座太平桥。为使神牛安驻,他们甚至还精雕了一只石水牛牯与之配对,至今仍置于车田村老围门口。建桥时,更有“经办者不得私吞分文,否则誓将绝后”的严苛自律,以及将余款兑为金条窖藏桥体以备后世修葺的深远考量。

历史的烽烟与民间的玄想,共同编织成太平桥厚重的文化肌理。而它最令人动容之处,还在于其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的坚挺。2019年仲夏,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侵袭了杨村。洪水肆虐,水位竟漫过桥面将近四米!浊浪排空,裹挟着断木残椽,以毁灭一切的气势冲击着这座高龄古桥。许多现代的构筑物在自然的怒吼面前轰然倒塌,而太平桥,却在惊涛骇浪中,宛如中流砥柱,岿然不动。洪水退去,它依旧沉默地屹立着,只在桥身上增添了数道水渍,宛如一位老战士添了几道荣耀的伤疤。乡人感其坚毅,亲切地称它为“桥坚强”。这一声称呼里,是无比的骄傲,是深入骨髓的信赖,更是对古代工匠极致匠心与诚信精神的最崇高礼赞。它用事实证明了,真正的坚固,源于对每一道工序的一丝不苟,源于将承诺融入建筑血脉的真诚。

如今的太平桥,早已被列为保护文物,吸引着远近的目光。它静默于山水之间,守候日升月落,江水长流。它是一座通行的桥,连接着此岸与彼岸;它更是一座精神的桥,连接着历史与当下,连接着刀兵与弦歌,连接着神秘的传说与坚硬的现实。它上面镌刻的,是智慧的闪光,是秩序的渴望,是信仰的执着,是坚韧的力量。这力量,比花岗岩更硬,比太平江水更长,静静地,在这奇绝的青山绿水间,放射着永恒的光辉。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冬天,赣南的风里带着刺骨的寒。雩都县(今于都)城西的贡江边,一位青衫学者正对着浙东方向长揖及地。那是黄弘纲在绍兴为老师守丧三年后,回到家乡的第一年,他在贡江祭奠逝世四周年的恩师王守仁。

黄弘纲家族的族谱上,记载着春源公自赣县迁雩的往事。这个家族像赣江的支流,默默流淌了数百年。祖父延本、父亲思盛皆“默修德不求声名”,这种浸润在血脉里的沉静,或许正是黄弘纲后来能深得阳明心学三昧的根基。

黄弘纲五岁能识字,十岁成秀才,少年得志的他却常在书院夜读时怅然:“理学久湮,望程朱复出。”那时的他不会想到,改变他一生的人,正沿着赣江逆流而上。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守仁平漳南乱后,先是在于都罗田岩聚讲,随后在赣州郁孤台下的濂溪书院开讲。那日在郁孤山下,江风浩浩吹来,阳明先生青衣素袍,阐释“知行合一”之旨。黄弘纲立在芸芸听众中,三日后行拜师礼——这一拜,便是生死相托的开始。

据传,阳明先生曾笑称这位弟子“一日千里如子,莫非吾老友乎”,这不是寻常的客套。在众多门人中,黄弘纲的“性静端方”独具特质。阳明先生常让他教导新入门者,“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

同乡何廷仁科场失意时,他曾劝道:“当忧圣贤之学未明,不忧科场之不利。”这话里,有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真精神,也直接影响何廷仁暂时放下科举,一心追随阳明先生。

最见真章的是那些随师游学的岁月。从军营到城郭,从赣南到南昌,数年不归乡。昏黄的油灯下,他记录着老师闪烁灵光的话话,这些笔记后来成了《传习录》的筋骨。

师生间书信往来间,阳明先生说:“良知无内外,惟反求诸己则明。”他答:“知而不行,非真知;行而不知,非真行。”思想在纸上碰撞出火花,也照亮了后来江右王门学派的成长之路。

嘉靖六年(1527年),沉寂许久的王守仁又获王命。赴广西平叛前,经过赣州时,他将赣州阳明书院托付给了黄弘纲。那一刻的信任,成就了心学在赣南的星火传承。而黄弘纲的学问,也在岁月中完成从“持守”到“自然”的蜕变。

早期,黄弘纲主张“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像严守门户的守夜人;晚年则悟得“不致纤毫之力,一顺自然为主”,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尤其难得的是,当同门将“意念之善”混同良知时,黄弘纲犀利指出:“以意念之善为良知,终非天然自有之良。”这话击中了“王学”后学流弊的要害。黄宗羲后来在《明儒学案》中盛赞他“善推阐师说”,确非虚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的那场急变,让所有阳明弟子措手不及。老师病逝南安的消息传来,黄弘纲即刻奔赴,见到的是停灵南塾驿的棺槨。扶柩回渐的路,成了最漫长的告别。千里路途,每遇祭奠,他执礼如孝子。余姚安葬后,他结庐墓旁,守足三年。诚然,这已不是简单的仪式,而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守护。

更大的考验在阳明先生身后。其幼子正亿(王守仁嫡长子)才4岁,家族暗流涌动。黄弘纲与同门清理遗产,“立三本合同”,又促成黄绾嫁女护孤。当黄弘纲把王正亿护送至南京黄绾家时,临别赠言:“勿忘先君‘致良知’之教。”四十年后,王正亿袭爵新建伯时说的“非洛村先生,吾无以至今日”,是对这段师门情义最深的注脚。

晚年的黄弘纲,在故里讲学。当年汀州府推官任上的“执法如山”已成往事,此刻他只是个一介布衣。但听他讲学的,不仅有本地俊秀,还有远道而来的求道者。《明儒学案》中,赣州府入选的19位学者,于都独占6人,多与他有渊源。

乡人传说,黄弘纲逝前,曾朝着浙东方向行最后的弟子礼。如今于都人说起“洛村先生讲学”“千里送师归”的故事,眼睛里还有光。显然那些族谱上的记载、方志里的文字,最终都化作了江边的风,年年吹过赣南的青山。

黄弘纲最动人的,不是他对心理学理论的贡献,而是那种将学问化入生命的态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求学最本真的模样——不是纸上的义理,而是风雨中的扶持,是生死际的担当,是灯火相传的温暖。这或许比任何精妙的哲学辩论,都更接近“致良知”的真谛。

# 史志中的南康牌坊

□吴荣康



南康历史悠久,是江西省最古老的十七个县邑之一,也是赣南地区三个古县邑之一,“人安物阜”“士知向学”,文化发达,文明昌盛。

在中国古代,牌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交汇点,它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风景区标,还是一处地域的文化标识,更是一个地方的道德风向标,它代表和倡导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知礼信”等价值标尺,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铸造国人品格的基本导向。所以在古代,看牌坊,晓文明,知民风。

南康的牌坊也是如此,在历代纂修的县志中,对县城中历史存留和时建的牌坊,均有清晰的记载。如今,这些牌坊虽然随着历史的风尘烟灭了,但透过史志典籍的记载,通过对坊名文化的解读和品悟,我们仍可以清晰地接收到久远的历史文明传递到今天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内涵,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南康的重学讲礼、文明向善的社会风气。

据明嘉靖版《南康县志》记载,南康城内建有25座牌坊。清同治版《南安府志》则记载了22座牌坊的名字。这些牌坊遍布南康大街小巷,成为古代南康城中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明代以前建有牌坊分别有:秀公坊、甲科坊、御史坊、省元坊、苏步坊。

明朝中期以前所建的牌坊有:万寿坊、进士坊(赖礼)、进士坊(蔡彬)、秀绣坊、卿进士坊(王纪)、登云坊、上寿坊、登科坊、腾蛟起凤坊、科甲连登坊、敦崇俊良坊、群英坊、观风坊、肃政坊、章江古治坊、庾梅坊、迎恩坊、雍和坊、绿池坊、桂林坊。

以上牌坊有纪念名人名宦的,比如“秀公坊”就是纪念宋代南康知县陈升之,县志载“以邑宰陈升之后谥秀公,民思其德,故立”。陈升之死后朝廷封其谥号“秀公”,南康百姓追念他治理南康时的德行,故立牌坊以纪念。还有著名的古南康八景之一“苏步名坊”,县志云“以宋东坡南还,至田如鳌六经堂留题,故名”,就是纪念大学士苏东坡路过南康,寻访名贤,并在南康东街游览的人文盛事。

有地名标识和景物文化的,比如万寿坊在县东北,以由此往祝圣道场所,故名,洪武己巳(年)主簿钱翊重建;章江古治坊在南门外;庾梅坊在县西七十步,由此至庾岭,故名;

迎恩坊在县东门外;绿池坊在县东,以本处池水深绿,故名;桂林坊在县东南隅。

有反映政风整肃和民风醇和的,比如观风坊在县前岭北道左;肃政坊在县前岭北道右;雍和坊在县东,以里人和辑,故名。还有褒奖长寿老人的上寿坊,志云“在东门外,为,县丞李瑛九十有五建”。在当时的条件下,年过90岁的长者少之又少,更何况又是一个当过县丞的95岁老人,确实值得建坊以志之了。

嘉靖版县志记载更多的是夸耀功名、庆贺科举的功名坊。功名牌坊是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文化建筑,是夸耀家族人才昌盛的长久的无声广告。古代南康城里的各家族,中了进士或者举人,或者当了大官之后,均会在重要地段、街巷或宗祠前建立一处极尽雕工的牌坊,并树以坊名,以纪功名。比如大名鼎鼎的省元坊,即西街上“为宋省元刘必达建”,纪念刘必达在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春闱中,勇夺“省魁”,也称“省元”。此外还记载有,腾蛟起凤坊在儒学左,为嘉靖辛卯科举人黎国士建;科甲连登坊在东门外,为嘉靖戊戌进士刘昭文建;敦崇俊良坊在西门外,为嘉靖己酉科举人吴霖建。这些都是坊名坊。

西街上有一个著名的宋代官名坊,叫御史坊,事关一个重要的南康历史人物。县志载:“御史坊在县治西,为进士田如鳌建。”田如鳌是南康著名大教育家、隐士田畴的儿子。田畴游学不仕,返乡后专施家族教育,8个子侄各精授一经,教出了五六个举人进士,其中以田如鳌在政坛上成就最高,官至监察御史。相关史料记载:“(田如鳌)徽宗宣和六年进士。为丞相吕颐浩所器重。(宋)高宗召问江右盗贼,如鳌言小寇不足虑,所忧者西北。”可以看出,田如鳌是北宋末宣和年间的进士,后来又在南宋为官。当时江西多地出现了盗贼,宋高宗赵构深以为患,就召来自江西的田如鳌到朝廷奏对。而当时南宋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内部小盗贼,而是来自北方的金国大患。所以他对奏出“小寇不足虑,所忧者西北”这种直言。

此外,还有很多是赞颂民间善行义举的牌坊,譬如好义可嘉坊、乐善好施坊等。从这些记入府志、县志的牌坊名字来看,可以看出古代南康崇尚节义、好善重礼的社会风气。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的文脉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日趋昌盛;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人重义经商,同心创造,“无中生有”;正是这种风气,让南康人一心向上、宽容待人,荟聚英才。

『雪都理学五子』之一  
黄弘纲：心灯一盏照贡江

□龚文瑞